

批評與回應

《文化研究》第三十期（2020年春季）：204-211

重新思考《新青年》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對王琛學者書評的回應

Rethinking *New Youth*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 Response to
Chen Wang

周麗卿*

Li-Ching CHOU

學者王琛為我新近出版研究《新青年》的專著——《探索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新青年〉與民初政治、社會思潮》，撰寫長達十餘頁的書評（以下簡稱「王文」），我深表感謝。針對《新青年》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民初政治、社會思潮、編輯作者之間的複雜關係，王文提出數點不同意見。本書僅發行中文繁體字版，能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浩如翰海的相關研究中，得到王琛用心撰寫的書評做出回應，我實感榮幸。拙著中已屢屢提到，從大陸學者師友的指導與相關著作中獲益良多（周麗卿2016: 333-334），我將此次的回應視為兩岸學術交流、對話的延續。

我很高興通過閱讀這篇書評，對王文有進一步的了解。然而，對於如何理解《新青年》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我與王文之間仍存在著一些差別。因此，首先我希望梳理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現代學者之間的詮釋問題。

誠如我於本書前言引用美國學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對於兩岸詮釋的看法：「從1949年兩岸分裂後，兩岸官方與學界對新文化運動的不同詮釋，也意謂著關於歷史人物與政治團體的探討，伴隨著時代的定位與服務於政治的不同需要，互相拔河角力」（ibid.: 3），以至兩岸當代學者對於五四

投稿日期：2019年8月5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8月28日。

* 周麗卿，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詮釋的文化養成背景、甚至抵抗此一養成背景，重新論述藉以抵抗兩岸各自既有意識形態所支配的五四政治正確的邏輯。也就是不同意識形態陶冶、形塑下產生不同的閱讀文本的角度，又不自覺地抵抗既有意識形態的框架，所產生詮釋者的內在緊張關係。藉由王琛學者的回應，在五四運動適逢一百週年之際，我閱讀到這種文本角力的張力，甚至成爲一種潛藏於作者敘事的無意識。如我亦然，亦即經歷既有五四敘事离心力的過程，繼而反抗不同意識形態的「他者」所建構的五四敘事。這麼看來，儘管我與王文在認知上有諸多差異，但其實在思考邏輯上是一致的。我們都希望從既定的論述框架中脫逸而出，而與我們既有的意識形態、歷史敘事對話，甚至抵抗。只不過兩岸的意識形態差異甚大，但這反而更加豐富五四敘事的多元樣貌，以下我將會作更細緻的說明。歷史從來不是定於一尊，這是何以《新青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永遠不會缺席於當代的焦點問題中，即使它已是消失一百年的歷史，它永遠與當代政治、社會、文化事件常相左右，方興未艾。

基本上，拙著的《新青年》研究定位爲「補史之闕」，而非意在「翻案」。若是「翻案」則是全然否定《新青年》作爲五四新文化、思想啓蒙的刊物，我從未企圖否定此一學界的基本共識。而是嘗試透過不同的研究進路，去「探索」《新青年》「與」民初政治、社會之間的雙向關係，能對了解《新青年》「作爲新文化運動核心刊物的政治動能有一番新的認識。」（*ibid.*: 331）。因爲兩岸學界從文化、思想啓蒙此一面向，已有相當詳盡的討論、研究、梳理（事實上在拙著〈前言〉已作一文獻回顧的整理〔*ibid.*: 4-6〕），拙著僅是在許多前人的肩膀上所作的進一步探索，這是補《新青年》詮釋史之闕。因此，作爲臺灣學者求學階段所接受的歷史教育，於我本身必須面對的問題意識在於：如果《新青年》是胡適一脈自由主義者的歷史敘事，政治成爲文化運動的對立物，排除在新文化運動作爲「中國的文藝復興」之外，¹那麼何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會產生政治動能的果，從而產生之後不同政治光譜的展開。而於大陸學者所接受的意識形態教育洗禮，或許可以這樣說明：1950-80年代多強調《新青年》作爲共產

1 經由胡適的宣揚，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西方是以「中國的文藝復興」爲人所熟知（余英時1999: 1）。

黨的機關刊物，刻意忽略第八卷之前非黨刊的自由多元立場，與當時大陸官方意識形態認為五四運動是受俄國十月革命、馬列主義影響的立場相互呼應（*ibid.*: 4）。而在當代新的一波啓蒙思潮影響下，與前此官方立場有很大的不同，而王文的脈絡也近似此一啓蒙思潮影響下的1980年代前後知識青年的理解視野。筆者與王文切入歷史的問題意識點雖各有不同，但內在思路是一致的，並無扞格，拙著意圖梳理《新青年》同人此一過程的抉擇、徬徨與分歧，也並無意推舉後來《新青年》轉向之後的思想。

因此，王文開篇即指出其質疑本書的主要基礎，其一是蘇俄革命以及它對1920年代中國的影響，以致於將列寧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混為一談，而未能援引秦暉的著作，以周全研究思路。筆者也必須說明，當然經典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不同，我在陳獨秀與社會改良主義者的論爭當中，即主要分析德國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派）與俄國馬列主義之別，如王文中所提到的。至於提點筆者「經典馬克思主義經過蘇俄轉手後是如何異化的，因為陳獨秀等人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是從俄國（特別是列寧）那裡而來」。拙著亦曾於《新青年》雜誌封面的改變，引用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考證，說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所接受的是受布爾什維克主義影響，而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政治運動』的美國社會黨的綱領，使其由原本針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術研究，變為列寧式運動論和組織論的吸收」（*ibid.*: 215），²因而我在該章第四節結語中（*ibid.*: 71），將其歸類為廣義馬克思主義。³但引用《論革命》一書中對馬克思的批判，確有不妥，因其易導致誤解，亦深為感謝王文的指正。然而，《新青年》左轉後接受的列寧主義，王琛認為是「無視於民族主義、救亡的」，筆者並不同意，於拙著中筆者亦只說明其與「國族生存」、「民族主義」之聯結性，並未等同或認為只出於「救亡」、「民族主義」。儘管我與王文對於《新青年》左轉後接受的列寧主義與中國在地化過程的距離的理解有所差異，但我們都同意當時的思潮與政局之間的

2 在1920年下半年以後傳入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文獻主要來自歐美的英語文獻，當時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借助外國的共產黨來摸索共產主義運動及「共產黨」的形態（石川禎浩2006: 47）。

3 筆者必須說明，兩岸使用馬克思主義語境略有不同，甚至兩岸對於社會主義的定義，可能本身就存在一些細微差異，以致於造成閱讀的誤解。當然拙著的詞語使用，仍需進一步精確。

複雜關聯有待進一步探討，也都有多種可能性，未來也當再進一步展開。

然而筆者也必須說明，拙著處理的焦點在於《新青年》與民初政治、社會思潮的共振，至於清末民初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接受史，這些都是與《新青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相關重要的議題，都是全景的一部分，但也需於另外有專文討論，才能較完整的說明。甚至於清末民初俄國革命的接受史，亦不僅止於討論列寧革命，也當及於先前的二月革命，甚至舊俄時代的虛無黨在中國的接受史，如：馬君武翻譯《俄羅斯大風潮》對清末革命知識分子的影響（周麗卿2011），都要一併納入視野。但目前學界的研究大部分著力於列寧十月革命對1920年代前後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但就筆者長期接觸清末民初無政府主義、各種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流變史，這塊領域的挖掘將有助於我們更深層的理解這些新文化人在清末思想接受系統的多元、複雜性，及他們到五四前後思想的轉變過程。而就陳獨秀本身而言，他所接受的影響，也是極為複雜多元的，他的思想資源絕非僅止於經典馬克思主義、馬列主義。筆者曾著專文討論清末蘇曼殊與陳獨秀合譯法國叢俄（雨果）《悲慘世界》（時稱《哀史》），譯本有一半為原著所無的岔出情節，可以說是譯者的再創作。《悲慘世界》的譯介，有助於理解蘇、陳早年的政治思想、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運動的關聯。尤其是第十一回以後的續本，筆者認為乃由陳獨秀所續，其中所蘊含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根苗，成為理解陳獨秀五四時期對工人階級的高度關注，以致後來思想左傾，其淵源的可能線索之一。也就是說，相關線索相當龐雜，這也是處理《新青年》思想難度甚高的挑戰。因此，筆者的處理方式，是以議題式的討論方式，細緻的進入相關原典文本分析，藉以聚焦，背景知識則收絡於整體行文脈絡中，避免過度發散。但這有一缺點，也是筆者不能迴避的問題，即是個案思想分析無法進行長時段／短時段的參照分析，也易導致讀者誤讀。關於陳獨秀的研究，未來仍需結合長時段／短時段的分析，作進一步的開展研究。

其次，關於1919年之前無政府主義與《新青年》關係的質疑。拙著指出兩者「並非兩派互不相涉的刊物」（周麗卿2016: 141），王文認為拙著幫助讀者重新認識兩者的關係，但是卻沒有注意到兩者的「不同一性」。事實上我在該節之第一小節標題即為「民權與民初政局之反省：《新青

年》前期與無政府團體思想之親合」，是兩者同基於對民初政府法律與人民自由互相對立而「親合」——親近合作，至於對自由的內涵理解各有不同，當然也種下他們後來分道揚鑣的原因。無政府團體在民初的發展，原本就與《新青年》各有不同，拙著無法一一詳述，為此我已於2014年12月於《國史館館刊》發表專文（周麗卿2014）。

但關於胡適的討論，王文花了極長的篇幅論證在「政治」與「文化」這兩者之中，胡適還是側重「文化」這一面的，而質疑拙著論述的邏輯仍是強調胡適「談政治」的一面。王文歷舉胡適的言論為舉證，然而這些相關的討論，是我在臺灣所熟悉的胡適一脈的五四敘事，因此在書中筆者刻意淡化在臺灣學界已廣為人知的胡適言論。筆者在討論胡適時，並非執著於認為胡適側重於「政治」或「文化」哪一面，更非否定胡適側重「文化」的面向，但此複雜性正如歐陽哲生指出陳獨秀思想發展「特殊的混雜性」，胡適亦然。我在論文中所要陳述的，是「去熟悉化」的過程，是去掉（而非除掉）胡適所廣為人知的側重「文化」面向，集中論述，而讓讀者正視《新青年》時期的胡適亦有側重「政治」的面向。於此，我早在前言（周麗卿2016: 13）即花相當的篇幅說明此一複雜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

也就是說，問題並不在於胡適側重文化／政治，各執一端。而在梳理胡適這一代人他們的思想底蘊必須注意到的，仍是中國士大夫的清議傳統，這是傳統的「士大夫」過渡到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仍內含的歷史底蘊。胡適自己也明文寫出〈黃宗羲與學生運動〉，表明知識分子主持正義的社會責任感。其次，胡適對於思想文藝的重視絕無可議，但我們作為讀者，探究研究對象的思想複雜性，也不能光從他的言談（他說了什麼），也要從他的實踐行動（他做了什麼）去佐證。研究者正是要在這些吉光片羽中，尋找蛛絲馬跡，探索研究對象本身的複雜性與內在緊張關係。

事實上，在1920年底《新青年》傾向分裂之際，胡適提出辦法「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要求陳獨秀聲明「不談政治」。胡適後來創辦了《努力周報》，如王琛所引胡適的話：「《努力周報》並不是專談政治的。『談政治』只是因為時勢所逼迫的，但是不放棄思想文藝方面〔…〕」，其實已經很好的概括拙著討論的胡適與「談政治」的距離了！事實上，當時著名思

想家張君勱早已看出胡適的政治傾向，甚至在《努力》撰文指出胡適發表〈我的歧路〉一文，屢屢提及「談政治」一詞，張氏認為「政治者實行之事，非空言之事」，是「行」政治，而非「譚」政治，否則對於實際政治並不能產生影響，已預知胡適談政治的窘境（ibid.: 279）。並且，研究胡適思想有一點仍需注意，由於胡適關於五四、《新青年》、學生運動的言論，包含日後的回顧追憶，橫跨數十年不同時空向度，其實也含括了當時他對所處的歷史情境、中國局勢的思考，而他的思想也在不斷轉變中，這是我們研究者在援引胡適言論時仍然必須掌握的分寸感。另外，就實踐行動來看，相較這位當年提出〈文學改良芻議〉、日後造就《新青年》文學革命盛名的胡適，在後五四時期，其實真正繼續堅守耕耘文學這塊園地，反倒是周氏兄弟了。

而梳理胡適注重政治的面向，也為中國的政治轉型提供另一種解讀的換位思考、另一種政治動能的可能（相較向來以《新青年》〔尤其是八、九卷〕作為塑造共產黨產生的政治正確的資源）。而此一政治動能隨著《努力》結束之後，1920年代末的《新月》雜誌、1930年代的《獨立評論》、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形成以胡適為首的所謂自由主義學人群。⁴而最後胡適在臺灣創辦了《自由中國》，灌溉了臺灣民主的園地，以迄臺灣成為全球華人知名的民主堡壘。因此，就這個意義來說，臺灣反而是直接紹承五四新文化運動自由主義一脈的正統。因此，在臺灣作五四研究，「五四」並非他者，而是「自我」淵源的回溯。作為《新青年》核心人物的胡適，透過文化與政治雙向的多重變奏分析考察，當此原本凝固的「文化」解讀參照系鬆動了、改變了，我們才能有不同的角度看待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而對「五四」所帶來的各種有形、無形的影響，政治、文化、思想、經濟等多元層面，都有新的詮釋的可能，也從而對二十世紀兩岸歷史、文化思想脈絡的發展，帶入新的視角。

唐人王勃詩有云：「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拙著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過五、六年的時間沉澱、修改完成，前後費時十年，往返兩岸，

4 而《努力》、《新月》、《獨立評論》、《自由中國》，形成了章清所謂「胡適派學人群」（章清1998），大致涵蓋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聚集與發展的縮影，通過辦刊物表達他們對時局的看法，也彰顯了他們的政治理念與價值歸趨。

請益相關學者專家、查閱相關原始文獻的成果。因此，王文的書評指出拙著在既有偏重思想啓蒙的闡釋路徑外，不局限於思想文化啓蒙，另闢蹊徑，透過《新青年》與民初政治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力圖揭示《新青年》對現代中國政治形式的探索與實踐，相較於既有研究中是最具沖擊力之處，於我實有知音之感。《新青年》與五四新文化研究之難在於既有的相關研究積累龐雜，且《新青年》同人包含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都是一代思想名家。然而在臺灣關於《新青年》刊物的研究、討論其實是不多見的，這其中當然有國府意識形態的因素。於是筆者得以保有某種「陌生化」的距離，浸潤於兩岸各大圖書館《新青年》原刊及相關刊物，甚至挖掘清末民初發行的一些珍稀期刊著作，對於構建刊物的歷史情境與《新青年》同人清末民初的思考活動，有種貼近歷史的感動。這些多方激盪的結果，促成了這本書的產生。

因此，筆者所認識的《新青年》文本，除了它廣為人知的思想啓蒙與文學革命，它也是一動態歷史文本——探索清末民初至北伐前期政治轉型的關鍵性文本。拙著意圖拉出這一條隱形悠長的歷史縱深，透過「民國」危機的主旋律，以政治轉型的探索為主軸，收攏這條龐雜的線索，如此才能較為清楚的說明《新青年》在清末民初政治語境中的關鍵思考位置。當我們有不同的角度看待《新青年》，也就有了不同角度看待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在這樣的思考下，拙著藉由探溯《新青年》相關刊物、人脈的完整譜系，再進一步梳理民初知識群體與世界潮流的共振關係與政治文化動向，目的是藉以了解二十世紀中國何以從西化走向馬列主義之路。這是我在臺灣作為一研究者，一方面希望藉由《新青年》了解二十世紀的中國發展脈絡，進而了解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以期對中國有較為正確的認識與想像。另一方面，也對臺灣民主的發展，透過胡適的政治／文化的系譜研究，說明臺灣與五四新文化直接紹承、連結。這是我與王文對《新青年》思考立場不同的根本因由。而作為影響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刊物，對於《新青年》的詮釋定位其實也就如我一開始提到的，牽涉到兩岸文化霸權、政治話語主導權的位置問題，有其先鋒性與敏感度，這應也是王文對此議題感興趣之因。

最後仍是非常感謝王琛用心閱讀拙著繁冗的論述，撰寫此一書評，給予諸多寶貴的意見，使得拙著思路的開展有更豐富、周延、多元的可能。

引用書目

- Yoshihiro, Ishikawa (石川禎浩) 著，袁廣泉 (Yuan, Guang-Quan) 譯。2006。
《中國共產黨成立史》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englishi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余英時 (Yu, Ying-Shih)。1999。〈文藝復興乎？啓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Wenyi fuxing hu? Qimeng yundong hu? ——yige shixuejia dui wusi yundong de fansi” [Renaissance? Enlightenment? ——A Histo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收錄於《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啓蒙運動》 *Wusi xinlun: ji fei wenyi fuxing, yi fei qimeng yundo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new discourse: Neither Renaissance nor Enlightenment]*。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社 (Linking)。
- 周麗卿 (Chou, Li-Ching)。2016。《探索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新青年〉與民初政治、社會思潮》 *Tansuo xiandai zhongguo de zhengzhi zhuanxing: xinqingnian yu minchu zhengzhi, shehui sichao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New Youth an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s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臺北 (Taipei)：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s)。
- 。2011年。〈國族政治與翻譯：馬君武《俄羅斯大風潮》之譯介與改良立場的激化〉“Guozu zhengzhi yu fanyi: Ma Jun-Wu e’luosi dafengchao zhi yijie yu gailiang lichang de jihua”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th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Russia’s Big Wave* that behave Ma Jun-Wu from the reformer to revolutionist]。發表於「中文知識生產與亞洲社會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Zhongwen zhishi shengchang yu yazhou shehui zhuanxing guoji xueshu yantaohui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sian Social Transformation]*，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暨台文所 *Zhanghua shifang daxue guowenxi ji taiwensu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2014。〈政治、權力與批判：民初劉師復派無政府團體的抵抗與追求〉“Zhengzhi quanli yu pipan: minchu Liu Shi-Fu pai wuzhengfu tuanti de dikang yu zuiqiu” [Politics, Power and Critique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Resistance from and Pursuit of Anarchist Groups Affiliated with Liu Shi-Fu]。《國史館館刊》 *Guoshiguan guankan [Bulletin of Academia Historica]* 42: 1-30。
- 章清 (Zhang, Qing)。1998。〈胡適派學人群與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趨向〉“Hu shi pai xuerenqun yu zhongguo xiandai ziyoushuyi de quxiang” [Scholars belong to Hu Shih group and the tendency of Liberalism in Modern China]。《史林》 *Shi Lin [Historical Review]* 1: 36-49。